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第二辑 2003.1

茶座

- △文 军 从理论的“狂欢化”到学术场域的反思
△本辑聚焦 教育与社会
△孙立平 断筋——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
△钱冠连 野兽在嘲笑
△郑也夫 有性繁殖与婚配制度——社会生物学杂记之一
△周华山 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
△林聚任 哈佛社会学
△周 弘 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德国社会保险模式



山东人民出版社

NO.2



【卷首语】

开放社会科学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想的却是宋人笔记中的**剥葱丝**故事

奸相蔡京好美食，府中的包子以其美味蜚声天下。待得蔡京被革职拿问以后，有位好美食的官员千方百计罗致了蔡府厨房中的一个丫鬟，要她给自家如法炮制。不料，这个丫鬟竟然说不会。此大大为惊异，问道，你不是蔡府厨房中的人吗？回答颇让人出乎预料。答曰，妾乃蔡府中剥葱丝者也。

社会科学学科的现行划分，实际上，是 19 世纪以自然科学为理想范式、人为地强行加以分割的结果。在实证主义预设的前提下，学科之间筑起高墙壁垒，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沿袭至今，这样的知识分科已经日益成为人们探求知识的桎梏。当我们欢天喜地地忙于与这样的体制接轨之际——这将使每一位社会科学家成为一个剥葱丝的人，可能意味着我们将永远吃不到包子……这些学科边界其实正在日益变得模糊而不可辨识。这个道理，我们可举三位社会理论家为例加以申论：一是韦伯，二是哈耶克，三是华勒斯坦。他们的学术取径各不相同，其理论预设的前提与实践的含义也大相径庭，却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打破社会科学的学科壁垒。韦伯对那些询问他从事何种专业的人报以白眼；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社，鼓励不同学科打破专业化进行交流；晚近的华勒斯坦更索性写下一本以“开放社会科学”为名的书。凡此种种，都说明通过知识的重新整合以实现社会理论的重新取向和重新建构，乃是知识发展的大趋势。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科学学科内部要实现相互开放与相互融通，而且还意味着，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引进历史之维，另一方面，哲学反思也应与社会科学的经验探索齐头并进。

经过这样一番重新取向与整合，蔡府家的美味包子或许才能够重现江湖。

于 一

2002 年 12 月 20 日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于 一 开放社会科学/1

〔学术沙龙〕

文 军 从理论的“狂欢化”到学术场域的反思/4
陈 锐 社会学科交叉的理想与现实/8

〔本辑聚焦:教育与社会〕

王 建 大学也者,大楼之谓耶? /13
钱 钢 “可算度的人”
——从福柯说到考试地狱/18

李政涛 在教育与规训之间/24
萧 武 裂缝:穷人与大学/28

〔社会经纬〕

孙立平 断箭
——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34

成帅华 反腐杀手锏
——假定腐败为理性行为/43

刘祖云 转型社会的“名”与“实”/47
雷 颐 从女子曲棍球说到“退出”的权利/51

黄国泰 认知理论:心灵与现实沟通/55
孙美堂 克隆羊、维特根斯坦及其他/59

韩克庆 传统与现代的语丝思絮/62

〔众生世相〕

钱冠连 野兽在嘲笑/66
陈长林 论笑之拯救/73
王一梁 一幕现代主义的悲喜剧/75
刘 兵 忽发奇想
——关于“发言遥控器”的发明设想/80

赵铁林 一个即将离开故土的女子
——镜头里的社会之二/84

〔性与社会〕

郑也夫 有性繁殖与婚配制度
——社会生物学杂记之一/87

饶志华 我看“一夜情”/94

周华山 女性如厕与身体政治/99

〔城市空间〕

贺承军 房地产界三大俗/106

〔海客谈瀛〕

林聚任 哈佛社会学/109

夏 星 自由选择与社会责任
——从挪威王室的两桩婚事说起/116

〔社会史话〕

游潇潇斋 水浒社会人物谈片
——谈宋江/123

周 弘 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德国社会保险模式/131

〔夜读漫记〕

高全喜 带有苦涩的记忆
——常宗贤“票证时代”系列作品随想/138

〔学人述林〕

智效民 被遗忘的奠基者
——谈社会学家陶孟和/145

〔学术资讯〕

◇英国科学家认为人类男性正在逐步走向灭亡◇“行政垄断”已成为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类型◇人贱人爱——“贱客”新族群的兴起◇女性文化日趋强悍◇时尚流行男色时代◇《中国好女人》一书风行世界◇通过社会学去思考◇玛丽安妮的《韦伯传》◇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最后的知识分子



从理论的『狂欢化』到学术场域的思考

◎学术沙龙

文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过一系列的“终结”和“转向”之后,标有各种“主义”与“后学”名目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狂欢化”的盛况,似乎越来越不那么令人乐观了。许多在80年代对社会学理论的新观念趋之若鹜的人,早已感到了厌倦,“理论狂欢化”的热潮似乎越来越像是一种“理论的通货膨胀”,在90年代最后时刻的到来之前,就已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所谓“世纪末”的状态。愚以为,对像中国这样处于“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状态的社会学来说,理论研究尤为重要。中国社会学要想在世界社会学体系中取得“中心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特色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在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复出伊始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当然个中原因也有令人可理解之处)。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弥补,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说明的层次上,而无法在理论和思想上进一步得以提升。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因大量缺乏理论支撑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所带来的表面繁荣背后,实际上潜伏着越来越深刻的危机。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更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像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这不仅就像一个先天不足而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立稳脚跟,而且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像力的枯竭。因此,大力提倡理论的自觉性,加强学术场域的反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思，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学的学术实践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对理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理解，而且要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具有批判性的把握。如果仔细审视社会学理论在今天面临的危机，就不难发现，危机的一个明显症状就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现象呢？事实上，这一鸿沟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一个理论问题。具体来说，在科学哲学中，学者们早已对经验研究本身蕴含的理论前提达成一致，而在社会学界，无论是实证主义取向的经验研究，还是人文主义取向的经验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概念往往都是未经系统理论反思的常识性概念，而研究过程中对概念的操作化步骤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概念的“去理论化”。这样，这些理论要么在不自觉中沦为社会中流行的实践无意识的“代言人”，要么成为布迪厄所谓“学究观点”这样的理论无意识的傀儡。因此，提倡学术的“反思性”，是研究者在不断面对“难题局面”的学术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思维品格，一种对轻率言说和逃避“惯习”的克服。而如果缺乏这种思维品格和反思热情，社会学就很难达到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也许正因为如此，吉登斯(A. Giddens)才提出“双重阐释(double hermeneutic)”这一带有明显“反思”意味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其实，就其根本而言，与其说这一概念指明了社会学的一种逻辑，还不如说它揭示了现代社会与社会学之反思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社会学家所处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一时还难以改观。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大量变迁中问题的涌现，自表面观察，社会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也似乎很大，社会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这只不过是社会学家的一种错觉而已。社会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并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社会学家也许就离贫困线相距不远了，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社会学家提出



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社会学家无所不能,对一切问题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学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也可以自由驰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是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社会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其间的社会条件做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鲍曼曾经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原本作为知识与文化价值之立法者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此时已成了社会中“多余的人”。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诠释经典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业已丧失殆尽。这些,无疑都导致了知识分子(包括社会学者)的角色危机,人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提出诸如全球化、后现代等新时代、新话语的原因(为的是能够在当下这样一个人文社会学科正日益被科学所蚕食所取代的技术专制社会中,使自身的学科得以继续合法地保留其重要地位)。与科技专家相比,现代社会学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其重要地位而沦为一个“解释者”,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已被安全地限制在学院的大墙之内。

再次,社会学的学术场域中还存在大量的失范现象。目前,整个社会学的学术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对社会问题发表过议论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企业界的一些人士也在纷纷谋求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全球范围内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不断涌现,社会学界原来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社会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



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社会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超脱和自拔。

最后,社会学家的科学惯习也令人忧虑。科学惯习是一种“造就人”的规则,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规则,它根据科学的规范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并未明确意识到要把这些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所以只要消极被动地大量复制即可,并不需要积极地从事创造。也就是说,根本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无须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就能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极端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做是一项惟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因而在社会学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无疾而终,没有任何结果。对此,我们在不断进行反思和保持必要警惕的同时,一是要反对极端实证主义中不进行任何批判性考察就全盘接受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研究概念的做法,二是要反对那些视这种反思意向只是某种哲学心态渗透的常识性社会学。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根本上依靠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科学惯习来实现。

实际上,今天的社会学家已经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专业的纯洁性和独特性,他不能不继承和传播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从而可能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知识来代替日常性知识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如果要抛弃过去所谓的专业知识,他又可能失去学术传统所赋予他的知识工具和话语方式,从而可能沦为只能依靠自我启迪的“业余的”社会学家。对此,我们必须实现一种彻底的转换,否则,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就根本无从谈起。



· 学术沙龙 ·

社会学科交叉 的 理想和现实

陈 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科学教育界，诸如学科交叉、素质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倡导人文精神等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并在许多领域中进行了若干有益的尝试和实践。在中小学有各种艺术和业余兴趣的

培训，在理工科院校则引入文科的课程、讲座，扩大基础的比例等等。这种种努力，似乎都在向我们预示着“交叉时代”的来临。

但是，任何倡导与论证总是与现实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当然不是说倡导就不重要，而是说，假若我们愿意冷静地看一看现实，像康德哲学一样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已经做了些什么和还没有做什么，那么，对于单纯的倡导也许是不无裨益的。事实上，在我们当代社会中，已经有过太多的倡导。在五四时代有科学和民主，在 80 年代又有各种各样的潮流。即使在现在倡导学科交叉的同时，真正的现实又该是如何的呢？在科学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一定要走向交叉的。按照库恩的理论，科学像社会那样，在经过了最初的各种范式的竞争以后，就逐渐过渡到常规科学阶段。人们开始把目光从普遍的存在转向较为狭小和有限的领域，从定性转向定量，从理论的探索转向实证的研究。这时普遍的哲学转向专业的分工。可以说，整个西方科学都在经历这样的历程。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像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笛卡儿、马克思那样通晓多种学科和交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常规科学的发展导致更加精密的分工，定量和实证使科学技术在现实的领域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险，即走向机械、僵化和保守。因此，常规科学的发展最后导致反常、危机和革命，那时哲学的思考和学科交叉的时代又到来了。

* 作者为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当代社会未必像一些人所憧憬的那样在走向交叉时代。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在经过多次的教育改革以后，时代的潮流日益走向形而下的经验世界，教育与科学的管理都趋向规范、精密和标准化。人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一个个确定和有限的东西。这一切都意味着分工的日益精密，它符合时代的需要。学者们见面时通常会问“你最近在研究些什么课题”，而不会问“你在思考些什么”。人们关心的是现实的目标和确定的成果，而思想却往往是不确定和抽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科交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的效率，很难把力量集中在一些有限的目标上去得出显著的成果。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不同学科的交叉也很难适应定量管理的需要，因为学科的交叉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此外，学科的交叉还具有一种危险性，即“离经叛道”。我们所面临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已划分为各个学科和领域，在每一个确定的领域和范围中都挤满了那些已取得若干成就的人。假若你要想在若干个学科间进行交叉，那

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流浪汉，一个在秩序之外脱离了庇护的人，一个处于社会之外的人。

然而，科学的精密、规范和标准化尽管有助于管理和效率，但却会像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那样走向僵化、反常和危机。正是由于这种消极的方面，在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才会出现对素质教育、人文精神和学科交叉的呼唤和希求。这就如鲁迅所说的，人是缺少什么才谈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需要进行不同学科的交叉，我们需要摒弃那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需要从不同学科、领域的重重界限中解放出来，以自由的心灵去面对那本来就不可分的对象和世界，需要在国家级和省级这些有序化的管理之外，去创造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看看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的科学成果，哪一个不是在界限之外和边缘状态的产物呢？爱因斯坦戏称自己是一个“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人”，哥白尼是个业余天文学家，并不以天文学或从事天文学的应用来谋生，他不过是弗龙堡大教堂的司铎而已。

不过理想毕竟只是理想，它



可以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实,但不能代替现实。尽管素质教育、人文精神和学科交叉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并已在一些地方付诸于实践,但切不可过分乐观,因为许多共识和实践都往往是表面化的。例如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许多人总以为开设了一些人文学科的课程,让理工科的学生记住一些姓名、著作和概念,就算是具有了人文学科的素养,符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统一的潮流。这是极为表面的。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要用人文学去补充自然科学,就是因为自然科学倾向于严密和确定,而人文科学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包含着某种不确定的成分,某种想像、情感以及对世界的整体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弥补精密化的不足,可以为人的精神提供创造的活力和源泉。因此,尽管我们可能在表面上开设那些人文学科的课程,但又同时把《红楼梦》输入试题库,让学生去记住那些枯燥和千篇一律的答案,假若我们随时准备将现实的利害关系置于人格的尊严和正义之上,那么这样的人文学科又有什么意义呢?并不是每一个研究人文学科的人都

具有人文精神的,反之,一个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人,只要他具有起码的想像力、人格和尊严,倒可能比那些在时髦的口号后面沽名钓誉的文才子更像一个人文主义者。同样,我们的素质教育并不是让学生在不同的学科间蜻蜓点水,掌握各种操作技能,拿到各种文凭和证书,因为它们并不是什么学科的交叉,只是各种技能和知识的组合和汇编而已。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说,哲学本应占有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它是一切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应当对各门科学起到一种启发性的思考,认识其间的联系并提供整体的视界。但是哲学的这些任务都早已只是停留于表面的词句中去,哲学已成了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有它自己的领域、专业术语和规范,就如尼采所说的,哲学已经成为科学了。当然,它对其他科学也不是完全不顾,并偶尔采摘一些材料来增加论证,表示自己跟得上时代。至于科学这一方面,在它的教学和研究中,到处都是规则和僵死的知识,而且我们往往在加强基础和基本功的名义下,强化了这些规则和知识的重要,至于科学在



最初的创造中所包含的热情和思考，早已被作为不合规范和好高务远的东西被排斥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交叉本来也不应成什么问题。它们有的尽管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对其对人类心灵及社会现象的研究成果远未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的范式、精密、可预测性和荣誉，因而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就相对模糊些。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中，那种规范的教科书的地位相对也不那么重要，学习者和研究者需要面对的是无边的文献的海洋和变幻不定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理论上也承认很难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划清明分的界限，承认在对社会现象和人的研究中需要一种密切的综合，正如让·皮亚杰所说的，“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例如历史学就很难做出归属。再如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记得有一种说法，即在历史中，除了人名、地名和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而在文学中，除了人名、日期等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然而尽管如此，在现实的研究中，

界限仍是大量存在的。当代中国的许多学科经过了 80 年代的重建和 90 年代的发展以后，学院派的趋向明显加强了，这从许多学者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来。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毕竟依赖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各种现实的利益、规范和限制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学科间的壁垒，就如在经济生活中如果自由竞争消失也就往往走向行业垄断一样。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对定量分析和经验描述的较多关注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科间的沟通。人们知道，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西方城市、工业文明和世俗化的过程而出现的，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致力于对具体和特定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比较、归纳和定量分析，使对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实证和经验的基础上。它们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繁荣，但在注重现实和应用的同时也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说，越是注重现实、技术和操作，就越容易走向门户的分割。在这时候，惟有人类的思想、心灵才能冲破那些阻隔，以到达整体和普遍的存在。科学史已经表明，西方科学的成



就在于逻辑、数学、抽象的理论与经验观察、工匠两种传统的综合，而前者是与人的思想、对世界的抽象和整体的思考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科学所追求的简单性的原则，越是普遍的也就越是简单的。人文科学的意义本在于提供一种自由的心灵和整体的思考，但它在许多时候也孤立为一些独立的学科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记住那个被克罗齐看做是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创始人的18世纪意大利的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中同时包含了两种对立的传统：一方面是柏拉图的影响和适用于一切民族的理想、永恒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塔西佗的现实的人和语言学的证据。

此外，对于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人来说，学科的交叉似乎还增添了一重困难。从一方面来说，中国的传统似乎并不怎么重视学科的界限，但在实际上，它比西方传统更强调规范和确定性，更不注重抽象的理论和整体的思考。中国文化自明代以后，就已经在八股文中走向标准化了。在清代的考据中，我们的学问则集中在越来越小的领域。黄宗羲和章学诚都在其著作中批评了当时

普遍流行的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这种传统到现在，使我们形成了崇尚专家和分工的文化氛围。社会需要确定性，那种对不同学科的广博兴趣会被看成是浮躁和高务远的表现，创造的冲动和思想则是狂妄自大和没有教养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同学科的交叉则是很难想像的了。

由此可见，学科的交叉依赖于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并不是每一个时代和个人都需要并且有能力去从事交叉学科的研究，它只发生在特殊的时代和个人身上。它需要有一种对世界自由探索的热情、力量和冲动，惟有这样，才可能冲破学科界限的桎梏，而不是被塑造为严格职业化的机器。学科交叉并不是先学了这个学科后再去学那个学科，而是要在不同学科间领悟到一种普遍的东西。一个人心灵的力量往往与他在不同学科中所到达的广度是成比例的。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成就，其创造的活力和源泉就往往存在于边缘和交叉中，这也就像金庸小说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如郭靖、杨过、令狐冲等，真正的境界和武功是对各种门派的交叉和融合的产物。



◎教育与社会

大学也者，大楼之谓耶？

——王建*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在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拉动经济增长的今天，大学也赶来“凑热闹”。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称之为“主楼”；红砖青藤的四层楼房被白瓷片蓝玻璃的六层楼所取代，称之为“改造”；一座座的教职工住宅楼耸入云霄，称之为“塔楼”；“培训生楼”、“科技开发中心”等创收自救的工程也见缝插针，纷纷上马。总之，在这股把一切都凝固起来的建筑潮流中，大量的教育经费化成了砖石与灰浆。

近年来，许多高校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次高的是建设国际知名的大学。我想，跟“国际接轨”恐怕是其前提吧？不妨让我们看看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办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从柏林大学的创办开始的。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场大败于拿破仑，割地赔款，易北河彼岸地区被割让，丧失了当时最重要、最完备的哈勒大学。认为“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所遭受的损失”的普鲁士国王发布命令，决定在柏林成立一所新的大学，“它（柏林）具有一座完善的全国性的教育机构所需的一切，能以最小的开支取得最大的效果”。尽管原来就不富裕且经济处于低谷的普鲁士从1808年起要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但国王仍应当时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柏林大学的参与筹办人洪堡的要求，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大学的经费。1820年，柏林大学的预算为24.1万塔勒，1870年达

* 作者为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到 77.4 万塔勒，而其中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1870 年柏林大学的建筑费用仅 6000 马克，占总开支的极小部分，而用于学科建设的科学研究和预算比工资预算多出一倍。这是不是说教授的待遇就差了呢？洪堡当时为柏林大学教授计划的标准工资是年薪 1500 塔勒，认为教授应有丰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够没有经济烦恼而专注于增进知识的主要目标。1834 年，柏林大学正教授的实际收入（包括工资、讲课费和其他收入）平均已达 2236 塔勒。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德意志北部港口城市，一个手艺人家庭的年生活费用约为 150 塔勒；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如面包师或细木工家庭生活费用需 450 塔勒，过得较舒适的需 600 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需 600 ~ 1000 塔勒。由此可知，柏林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高于一般中产阶级的。

正是因为如此的办学方针，柏林大学在初创时第一批教师便汇集了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著名学者，以后接踵而来的一流学者有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谢林、黑格尔，自然科学家普朗克。在一战前 42 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 14 人是德国人，其中柏林大学一校就拥有 8 人。在纳粹统治前，柏林大学可以自豪地宣称，该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或机构。柏林大学在 100 多年中保持了第一流大学的声望，德国大学成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师表。

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仿效德国的大学最为得力 and 用功，尤其是 187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美国商人、银行家和慈善家约翰·霍普金斯遗嘱捐赠 700 多万美元，其中的 350 万美元用于建一所大学，它不附带任何条件，只是学校的基金将不能用于校舍建筑。校长吉尔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欢将霍普金斯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说：“大学的声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早期没有建设校园的措施，甚至没有足球场，然而却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设备，看上去更像一座工厂或大的商店。当初，前去祝贺的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办典礼上演说道：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只能表示赞赏。在我看来，最明智的决定是不把目光局限于眼前。我经常看到，在那股把一切都



凝固起来的建筑潮流中，巨额的教育经费变成了纯粹的砖石与灰浆，而使本该用来资助学术机构工作的资金所剩无几。从前有位显赫的将军把某个地方夷为平地，却称之为和平；教育资金的管理者也往往筑起一座宫殿，而称之为大学。如果允许我冒昧地就一个我力所不能及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话，我要劝告你们，当你们建造房屋时，要物色一个诚实的砖瓦匠，让他来建造你们确实需要的房屋，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一个世纪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与俄亥俄州的股票价格超过了票面价值 1000 美元，而你们对所有必须资助的教授都已给予了帮助，并建成了你们所需要全部实验室，拥有了所能想像的最完美的博物馆和最完备的图书馆。到那时，如果你们还闲搁着几十万美元的话，那就可以请一位建筑家，让他给你们这所大学装修一下门面。……贵校明天即将正式开始实际活动了，希望它圆满地达到它的崇高目的。祝愿它的声誉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直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就像过去寻找波洛尼亚（意大利最早的中世纪大学）、巴黎或牛津那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常常被称之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史家称之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任职 25 年的校长吉尔曼不负众望，他为新大学招募了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大多数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将学校的中心工作放在提高科研实力和研究生教育上，取得了第一流的科研成果，造就了第一流的毕业生。据 1926 年统计，在当时 1000 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 243 人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毕业于该校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曾指出：“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约翰·霍普金斯的名字也逐渐有了一种享誉世界的意义，它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创时期，那些到西方取火的普罗米修斯取来的可是真经。蔡元培治校，“学校图书、仪器等之设备费，至少需占全校经费百分之四十以上。薪水及行政费，不得超越全校经费百分之六



十”。蒋梦麟执掌北大时，“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教室就可以上课”。在抗日战争前夕，北大以不动一草一木为原则，未运出任何设备，在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大时，一些学科离开了有基金和家当的清华寸步难行，所以作为三常委之一的他，自觉矮人三分，底气不足。当北大出身的傅斯年责备他不管事时，他却说“不管就是管”。在不断被炸毁又不断翻新的低矮的茅草屋中，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等顶级的大学者。

当然，这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座落在富裕的美国，当年的大学早已鸟枪换炮。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哈佛，总开支中用于大学水平的主要学科的经费还不到 1/8，罗斯福实施“新政”前后，哈佛大学有一半是新建的大楼，以至于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和改革家弗莱克斯纳惊叹道：“是谁迫使哈佛大学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

难道我们能跟着哈佛走吗？今天的哈佛年度预算达 10 亿美元，图书馆的年度经费达 4000 余万美元，每年新增图书 30 余万册，为加强大学的教学—投资就是 500 万美元，而衡量科研成果和水平的 SCI 论文每年有 8000 余篇（我们的第一学府北大不足 500 篇）。固然，我们的高等学校由于长期的经费短缺造成了高校教师的营养不良，教学科研用房不足，但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百废俱兴，千业待补。即便政府同意增加教育经费，对于庙多僧多事多的大学来说，也不过杯水车薪。但有限的资金如何用在刀刃上，大学建设中软件和硬件的矛盾如何处理，值得当校长和领导的睡不着觉，好好想想。我们总不能待在漂亮行政楼里一间装有九支灯管的办公室里，而看着图书馆里 1/3 的书架得不到充分利用，闻不到号称大学重镇的书香；学生沐浴不到大师的风采且不抱怨，因为那要求太高，但至少不希望被堂堂都是百人的大课来加工，在建成流水线上成批量地生产……

说起高校的建筑任务，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盖房子是干什么用的。翻开《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得知，在当年新增的建筑面积中，27.6% 为教学及辅助用房，16.5% 为学生宿舍，40.7% 为教工及家属住宅，多半是安居工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学生和教职工校内聚居